

中国宫廷政治

王连升 主编 — 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國 宮廷政治

王连升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撰稿人：王连升 陈益民 蒋宗明 刘庆楚 宣兆琦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宫廷政治/王连升主编;王连升等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40 - 4409 - 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宫廷 - 政治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186 号

中国宫廷政治

ZHONGGUO GONGTING ZHENGZHI

责任编辑 樊爱香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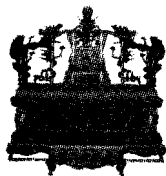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4409 - 7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8 - 7641044



目 录

绪 论 /001

——皇权与宫廷的产生

传统教育与特殊的家庭影响 /007

——皇帝的成长环境

- 一、不同成长环境造就不同的人…………… 007
- 二、东宫教育…………… 010
- 三、志趣培养和性格塑造…………… 014
- 四、早年的教育和经历对皇帝的影响…………… 016

创业、守成与败家子 /020

——皇帝作为类型分析

- 一、创业之君…………… 020
- 二、守成之君…………… 030
- 三、败家子…………… 041

不断完善的权力中心 /050

——皇权强化的制度与权术

- 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 051

二、专制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054
三、皇帝对权力中心的控制	067
四、结语	076

造神运动 /077

——皇权的圣化与神化

一、神化王权的理论基石	077
二、王权神化的外在体现	082
三、神化王权的目的及影响	097

外戚的困惑 /106

——外戚干政问题分析

一、备受褒崇的外戚	106
二、外戚之助	111
三、祸国殃民的势力	114
四、女祸与外戚之祸	118
五、历代对外戚的防范	122

皇帝的家奴 /128

——宦官擅权现象剖析

一、宦官的历史渊源	128
二、从低贱到尊显	131
三、宦官专权种种	138
四、宦官的双重人格	143
五、结语	150

神秘的后宫深处 /151

——皇帝与嫔妃关系透视

一、销魂荡魄之地	151
二、残酷的生存竞争	154
三、废立皇后的风波	157
四、帷帘干政	160
五、后妃的不幸	164

通则与变异 /168

——嫡长子继统制及其他登基方式

一、嫡长子与继统通则	169
二、农民革命与皇位变异	173
三、民族战争与皇位更迭	176
四、喋血宫门与黄袍加身	178
五、着古人装 演今人戏	180
六、人臣、奴才对皇位的干预	183

人性的变异 /186

——皇帝变态人格面面观

一、困扰皇帝的危机意识	187
二、皇帝人格变态的几种表现	190
三、受帝王焦虑情绪影响的决策中枢	195
四、从心理压抑到狂暴情绪的发泄	199
五、压制臣民的人性	202

血色黄昏 /208

——皇帝晚年的幸福与灾难

一、安享晚年的皇帝	208
二、不尽烦恼滚滚来	210
三、祸起萧墙	214
四、晚年苦酒	217

未来奏鸣曲 /224

——皇嗣问题面面观

一、继嗣之忧思	225
二、环绕太子的角逐	230
三、赌徒们的悲喜剧	234
四、太子的辛酸	237
五、秘建皇储之制	240

绪 论

——皇权与官廷的产生

上古时代，正当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的神职人员，与世俗统治者不断地展开斗争，以削弱世俗统治者的专制权力之时，当时的中国却走着一与此不同的道路。这就是，统治者凭借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了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他们顺从的奴仆。

中国古代统治者加强专制权力的活动，我们不得不上溯到黄帝时代。《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从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说明，我们的祖先黄帝的权力，是用武力取得并加以巩固的。

从黄帝传至禹，禹死后其子启即帝位。启同样用武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是“益干启位，启杀之”^①，继而“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②。

商朝的建立与巩固，同样不是和平过渡或民众的选举，而是处处以武力为先。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③《诗经·商颂·长发》讴歌商汤伐夏桀，其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①《竹书纪年》。

②《史记·夏本纪》。

③《孟子·滕文公下》。

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大意是说，商汤伐夏桀的威势如熊熊烈火，无人敢阻挡，就是夏桀加上他的帮凶，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被灭，九州诸侯齐服德。商朝建立后，商王率兵四处征伐的记载是非常之多的。另外，殷墟发掘的成千上万的甲骨文说明，商朝的统治者崇尚祭祀，凡事要通过贞人来请示上天。尽管这些贞人也像古代埃及的祭祀一样，担负着传达上天意志的神圣职责，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对卜兆的解释往往要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贞人这种仆从式的处境，当然就更不必说直接参与权力之争了。

周武王在以武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后，用分封同姓子弟亲戚和承认异姓部落国家存在的办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久，周公东征凯旋，巩固了对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分封之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存在一系列权力和义务的对应关系，如天子对诸侯有巡守、命官、迁爵的权力，诸侯对天子有进贡赋、服力役、行朝聘的义务。这些权力和义务，便是周天子专制权力的具体体现。诸侯对周天子所尽义务，都是维护天子权威的规定，并且用武力作为推行这些规定的后盾。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春，齐侯率诸侯之师伐楚，楚王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表齐侯回答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这就是说，齐率诸侯之师讨伐楚国的理由，就是楚国没能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时用以沥酒的苞茅。可见，诸侯尽义务是必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又如朝聘制度亦然。西周时规定，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为诸侯亲自去见天子。这个制度是不能破坏的。破坏了，周天子就要制裁诸侯。所以孟子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①

周天子的这种专制，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周室式微，诸侯坐大，卿大夫崛起，家臣活跃，社会开始发生激烈动荡。这种社会动荡的本质，是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这种新制度就是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就其本质特征说，这种政治体制从春秋时代产生起，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前后达两千五百多年。其间虽屡有变化，但仍不离其宗。因此，认真分析一下春秋时期君主官僚体制的产生及其特点，对于中国宫廷政治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①《孟子·告子下》。

春秋时期的君主官僚专制政治体制，是随着周天子和诸侯的相继衰落而在卿大夫这一层次上形成的。春秋时期，从外表看，各国诸侯依然存在，但他们多半都成了傀儡，实际权力都落到了卿大夫的手中。鲁国的三桓，齐国的国氏、高氏、崔氏、田氏等，晋国的六卿，楚国的屈、景、昭等，都分别执掌着这些国家的大权。秦国是后起的国家，虽为诸侯，其统治实则与东方卿大夫的格局相似，旧式诸侯的势力在那里并不像东方诸国那样强大。

由卿大夫一手建立起来的君主官僚政治体制，大体说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这种体制是卿大夫依仗自己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冲破了西周以来对其采邑的种种规定性以后，逐渐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初，束世澂先生曾撰文探讨诸侯封国与卿大夫采邑的差异，其中说：封国有政治、司法、军事全权，采邑则无有。束先生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但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就与此大不相同了。采邑之中不但有了决断国家大事的“家朝”，而且设置了各种官吏，有了军队，其政治权力结构与诸侯无异。卿大夫依仗这些条件，不断向诸侯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左传》一开始叙述的就是郑国的大夫、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利用自己的采邑京城发展势力，企图夺取郑国统治权的事实。以后，臣弑君、子弑父者更是屡见不鲜，故司马迁在与壶遂讨论孔子作《春秋》时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①例如，齐国的姜氏为原是大夫的田氏所代，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鲁国一直是三桓专权，光“政在季氏”就有数世；卫国在春秋中叶时，出现了孙、宁二氏的专权，以后又有齐氏、北宫氏、孔氏、南氏等执掌政权的局面。春秋中叶后，郑国的权力逐渐落入七穆之族的手里，以后又有罕氏专权。楚国则在灵王以后，政权稍稍落入令尹囊瓦之手，楚惠王时又有白公之乱，以后昭、屈、景三大族世袭执政。宋国在元公时，华、向两大族势力甚横，大杀公族，劫持宋君，以后又有戴氏、皇氏、乐氏“三族共政”。总之，卿大夫凭借自己的采邑，逐渐把持了各国的政权，形成了卿大夫主宰政权的局面。

第二，君主与官僚之间利益的分配已不再是君主赐予臣下封土，而是官僚从君主那里领取俸禄。春秋以上，统治者之间利益的分配只有封土赐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田之制，而无谷禄官俸之事，故《国语·晋语四》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左传·成公十七年》说：“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亦说：“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春秋中期以降，官吏、家臣等的利益体现在俸禄上，而不再是封邑、食田。如《论语·雍也》说：“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实际例子也是如此。孔子一度为鲁国大司寇并摄相事，官职相当高级，但他却只拿俸禄而无食田。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下野后，跑到卫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孔子的一些弟子，或为人家臣，或为人邑宰，担任了一些颇为重要的职务，然也是取谷禄为俸，非有土也。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分封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后，各国掌权的卿大夫建构新的君主专制所造成的。封土制的特点是，凡有封土即有民众，封土上的统治者就能够组织武装，就有了闹独立的资本。所以春秋以来，出现了天子不能制诸侯，诸侯不能制大夫，甚至大夫不能制家臣的现象。因此，封土赐民之制，实在是造成分裂割据的基础。及俸禄制度之兴起，臣下失去了土地人民作为抗上的资本，任之即是官，去之即是民，君主任免、驾驭臣下不再有什么困难，这就有利于新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所以说，谷禄制度的出现，实在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迁，在此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控制官僚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三，以卿大夫为实际专制君主的各国中央政府用郡县取代了封国以控制地方。中国古代的郡县产生在春秋时期，开始时县在内地，郡在边地，县比郡大，故《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讨伐范氏、中行氏时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因此，《逸周书·作雒》有“千里百县，县有四郡”之说。到战国时，随着地理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一些重要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大，郡才逐渐变成比县高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因为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吃谷禄，十分便于控制，这种制度发展比较顺利。所以说这种制度是适应了新的君主专制应运而生的，又成为新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县最早产生在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秦“伐邽、冀戎，初县之”。翌年，又初次在杜、郑设县。秦武公十年，即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为公元前688年。晋国县的最早记录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

郤缺，子之功也’”，因先茅绝嗣，故晋文公将其县赐予胥臣。从语义看，晋之设县应早于此，但究竟何年，无考，只好从本年叙起。鲁僖公三十三年，即晋文公十年，为公元前627年，这比秦设县晚了半个多世纪。楚国设县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598年。本年，楚子伐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①此乃灭陈以为楚县，这比晋国又晚了近三十年，比秦晚了近一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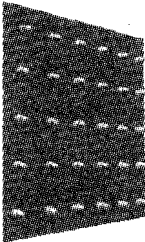
应当说，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是各诸侯国所必须要走的道路。但郡县为什么最早首先出现在秦国？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在笔者看来，县首先出现在秦国，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原来周天子的王畿之地，周天子对王畿的管理实行的是乡遂制度，即将王畿划分成六乡六遂，乡大夫和遂大夫为地方行政长官，由周天子直接任命。乡遂及其长官的直属性质不同于王畿之外的封国，这里没有闹独立的资本，与后来的郡县体制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县首先在这里产生就不足为怪了。更为有趣的是，在乡遂之制中，有一级行政组织就叫县。县者，悬也。乃有直属之意。如果说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中的因素发展起来的原理不误的话，那么就可以说郡县制这种新事物也是从它以前的旧制度中的某个因素上发展起来的。在笔者看来，乡遂之制中的县，就是郡县制的滥觞，郡县制就是在乡遂之制中“县”这个因子上发展起来的。二是与秦国的历史状况有关。秦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当它跻身于诸侯之列的时候，其他诸侯国已经在分封礼制文化的熏陶下走过了两个半世纪，分封制本身的矛盾已经相当明显。秦国从建国起，没有实行过分封制，因而没有礼制文化的负担，郡县制在这里出现要比在分封制十分完善的山东诸国容易得多。山东诸国虽然文化遗产丰富，社会面貌色彩纷呈，新生事物很容易在此萌生，但由于旧文化的积淀深厚，已经萌生的新事物要想在此成长壮大，却殊非易事。而秦国就不同了，这里传统文化积淀少，被东方诸国以夷狄待之，所以新事物在此产生、成长壮大，就不用与旧文化作殊死斗争了。同样的道理，郡县在三晋和楚国发展比较顺利，大概与礼制文化在这里相对于一些诸侯国不甚发达有关吧。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产生了如同后世皇帝那样的专制君主，确立了君主官僚体系，形成了以后循而未改的郡县制度，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封建权力核心。这个以帝王为首的权力核心，伴随着城墙的不断加厚、制度

^①《左传·宣公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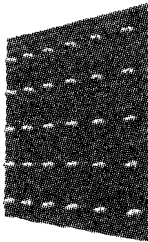
的不断严密而日益神秘。

中国古代的悲剧是，善良的人们只知对皇帝顶礼膜拜，把宫廷看得无比神圣。其实，宫廷之中围绕着权力这个魔鬼，进行着永无休止和令人眼花缭乱斗争。宫廷绝不是圣洁的殿堂。既然神秘的宫廷是封建政治的核心，那么，从多角度揭示中国宫廷政治的秘密，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宗旨所在。



传统教育与特殊的家庭影响

——皇帝的成长环境



中国古代皇帝是否有所作为，是奋发进取的贤君，还是残暴荒淫的昏君，无不与其志趣、性格和能力密切相关，皇帝本身的素质高低，极大地影响着他的统治的好坏。而一个人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其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一个人幼时的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和所经历的事，都对其个性的形成、能力的提高、情操的纯正与否产生着作用。分析帝王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种种教育和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皇帝的各种行为的根源以及他的某些统治方式的由来。



一、不同成长环境造就不同的人

自秦始皇嬴政至清末帝溥仪，中国历史上先后有数百个皇帝登上历史舞台。这众多的帝王由于各自幼时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的成长过程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人出自荣华富贵之门，也有人出身贫困潦倒之家。他们从小或无忧无虑，坐至皇位；或本无称帝企望，只因某种偶然因素而荣登王位；或历经了种种磨难，最终夺得帝位。他们幼时的不同生活环境和不同生活经历，造成了他们的性格、才干和见识的不同，由此也影响到他们称帝之后的统治。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有他那个阶层的人的普遍特征，无论出自皇家，抑或出自低贱平民，他们身上都体现着幼时所处环境给他们留下的印记。

古代不少开国皇帝是出生于平民布衣的。他们自幼家境贫寒，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备尝了人世的艰辛；他们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教育，诗书知之甚少，所学所习，无非是如何为自己的生计奋斗。然而，艰苦的生活条件，培养了他们的坚强意志和敢想敢干的精神，也使他们切身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百姓的艰难。他们的文化修养不一定高，但曲折的经历锻炼了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具备了非凡的见识，能在逆境中奋进，排除万难，最终登上皇帝宝座。如蜀汉先主刘备，幼年丧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形成了“好交结豪侠”^①的性格。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刺，仅识文字”^②，也是个从小历经磨难的人。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更是贫困之至，父母和三个兄长都过早去世，留下他一人，“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③，历尽了人世的苦楚。而正是像他们这样贫寒低贱的人，最终竟能在乱世中力克群雄，开创一国之基业。其中的奥秘，应该说就在于他们个人的素质与有利的政治环境的共同作用。年轻时的坎坷经历，把他们磨炼成了不畏强暴、敢于在逆境中奋进的人，并且因为见多识广，虽无文化，却能在乱世中独领风骚，深明打天下、治天下的要旨。后赵石勒的奋斗历程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石勒青少年时极为贫寒，曾为人农耕，到洛阳贩卖货物，还被人掠卖为奴，受尽了凌辱。而后来，在全国性的反晋斗争中，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西晋的主力军就是被他消灭的。他不识字，但很有见识，《晋书·石勒载记下》云：他“尝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他是不可能如此透彻地洞察是非的。石勒后来能够统一中原，建立一度与东晋对峙的后赵，是与其早年曲折的经历对他的个性的影响分不开的。

贫苦出身的帝王，由于在民间长大，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深切体会到民间的疾苦，因而他们在即位之初，往往能兴利除弊，实行种种恢复社会安定和进步的措施。如朱元璋，“本淮右布衣，幼苦孤贫，长遭兵乱，人之情伪，无不尽知”^④。因此，他即位后，重视农桑，免奴为民，以严刑峻法对待贪官污吏，诸如此类的措施，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的安定局面，起了

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②《魏书·岛夷刘裕传》。

③《明史·太祖纪》。

④《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十月，引何乔远语。

积极的作用。而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与他早年深受黑暗、腐败社会的压榨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有的皇帝生长于贵族家庭，其幼年的经历要比上述布衣出身的皇帝顺利得多，他们没有忍饥挨饿之虞，也不至于受到有权者的肆意凌辱。然而，他们个人征战天下的才干和勇气，也离不开严格的家庭教育。如唐太宗李世民，出身陇西贵族家庭，曾祖父李虎，为西魏太尉；祖父李昀，任北周安州总管；父亲李渊，历任隋朝谿、陇、岐等州刺史及卫尉少卿等职。“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①。世为武将，又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这使得骑射征战成为李氏家庭教育的中心。李世民生长在这样一个尚武的环境中，他“小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②，却“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③，这种尚武性格，正是环境造就的结果。他在随李渊征战天下的过程中，“聪明勇决，识量过人”^④，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个性。

从皇太子身份入承大统的人，其成长环境与上述两类皇帝迥然有别。他们在深宫长大，生活条件比长于民间的皇帝优越得多，而且，他们从小就受到较全面的文武之道的教育，为今后君临天下打下基础，因而他们的个性特点与那些成长于民间的皇帝就有所不同。

他们较早地受到诗书礼仪的熏陶，深明儒家礼制对个人修养和对朝政治理的重要性，一举一动，都在礼制规范的约束中。由著名学者或朝廷重臣担任的太子六傅，负责对太子的文化和思想教育，尤其是治国之道的灌输。正如《通典》卷三〇《东宫官序》所云：“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因此，太子从小就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一般都较早地懂得能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然而，皇太子从小养尊处优，在深宫中出生，在细致周到的照料中长大，未经艰苦环境的磨炼，不能像那些从风浪中闯过来的皇帝那样真正体验过社会底层的生活，也难以体会至高王权得来之不易，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开国之君“备尝艰苦，阅人多而历事熟，比长深宫，甚相远也”^⑤。皇太子未历世务，未经磨难，其性格有脆弱、幼稚的一面，而“太子东宫，官制甚详，如一

①《旧唐书·裴寂传》。

②《贞观政要·政体》。

③《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⑤《国榷》卷五，洪武六年。

小朝廷”^①，这种环境滋长了他凌驾他人之上的威严感，使其性格又容易形成固执、暴戾的一面，这对于他日后的统治有着极深的影响。历代王朝一个个由盛而衰，与从小长于深宫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那些败家亡国之君，由于幼时的生活环境的塑造，他们的个性出现了畸形发展的特点。他们治国无方，理政无能，却骄横跋扈，视国家大事如儿戏，以至于把国家引向了衰亡的深渊，自己犹不省悟。《宋书》论述南朝刘宋王朝的盛衰时，云“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做到了“戎车岁驾，邦甸不扰”。宋文帝刘义隆，为高祖刘裕第三子，生于东晋义熙三年，青少年时亦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因而继帝位后，能以宽仁御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而从小在宫中长大的文帝第五子刘骏，继承帝位后，朝政便发生了很大变化。“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世之盛，自此衰矣。”^②《宋书》卷五四“史臣论”云：当时“虽弊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可见皇帝个人素质的不同，造成了朝政好坏的极大差异性。国家由盛转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皇帝的个人行为的影响，而有意识的行为是在人的心理和个性的支配下产生的，论说国家盛衰的缘由，实际上应该追溯到影响皇帝个性和心态形成的皇帝早年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对皇帝成年后的所作所为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总之，民间与深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这不同环境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帝王，其志趣、个性和能力等，都会有所不同，这是我们研究帝王专制统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方面。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开国之君只是少数人，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王位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因此，在下文中我们侧重考察皇太子所接受的早期教育情况，至于起于布衣或官宦之家的皇帝早年所接受的各种不同教育的情况，此处从略。



二、东宫教育

历代王朝对皇太子进行的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文献通考》卷六〇，引《朱子语录》。

^②《宋书·良吏传序》。